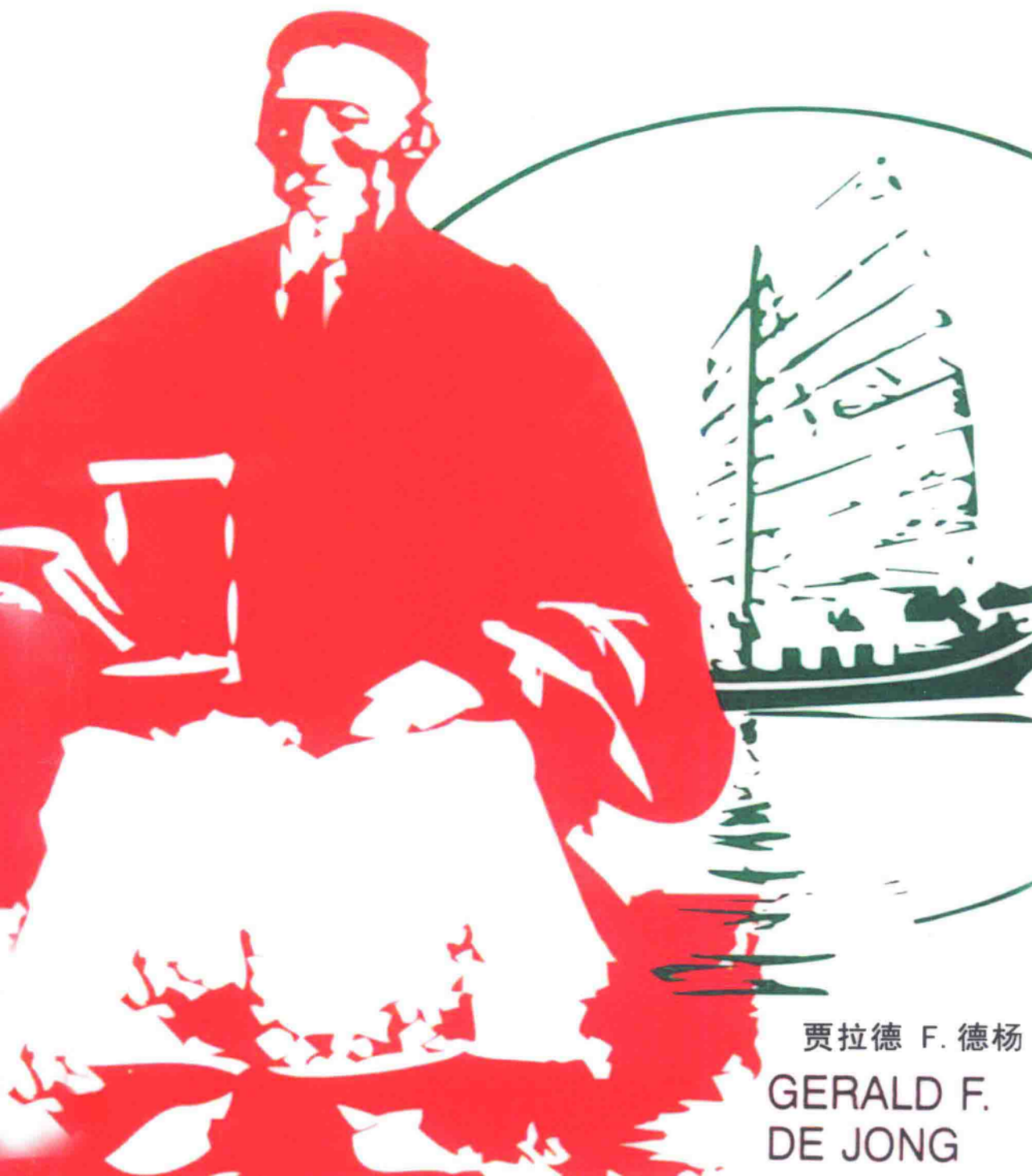


THE HISTORICAL SERIES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No. 22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1

美国归正教会在中国1842-1951



贾拉德 F. 德杨

GERALD F.
DE JONG

The Historical Series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No. 22

美国归正教会历史丛书第 22 册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1

美国归正教会在中国
1842—1951

(部分材料摘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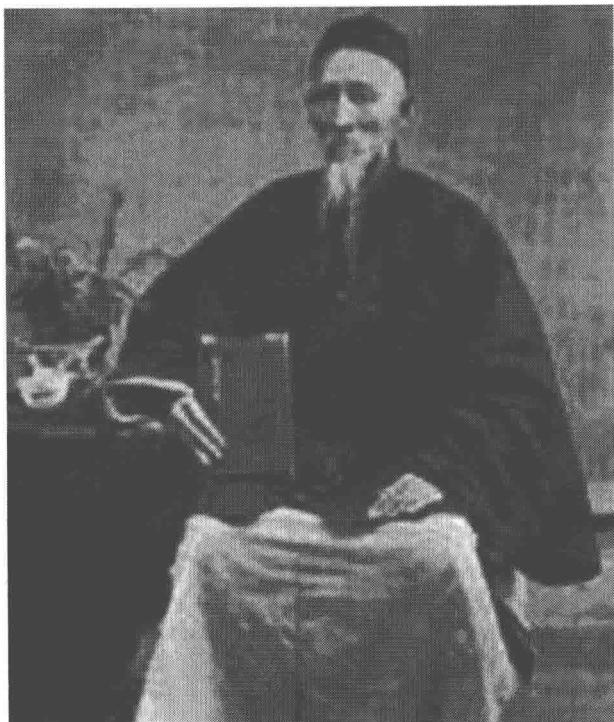
By

Gerald F. De Jong

贾拉德 F. 德杨 著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Michigan

出 版



Iap Han-cheong

叶汉章牧师 (1832~1907)

1863 年按立

(试译者附)

致 谢

我很感谢美国归正教会为我提供适量的补助金，以支付我为完成此书的研究所需要的旅费和其他相关费用。我也非常感谢许多个人的帮助，尤其感谢我的妻子珍妮特，她是我这一研究的得力助手，她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在电脑前为我打印，而手稿总是随时在增加，删除和更改。我也要感谢我的大儿子欧文，他慷慨地从其教职时间内，抽空费心地阅读每一章节，并提出有关文章结构和条理性方面的建议。还要感谢以下这些人：约翰·希姆斯特拉牧师，他借我一台电脑；罗素·贾赛罗，归正教会档案管理员，我在新不伦瑞克神学院的多次采访得到他的大力协助；阿瑟·黑克曼慷慨地允许我使用西北大学的图书馆设备；唐纳德·布鲁金克教授，本历史系列丛书的总编辑；劳拉·勃朗，本书的文字编辑。

贾拉德 F. 德杨

序 言

美国归正教是美国最古老的教派之一，第一次组织的聚会于1628年在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市）举行。像其他许多新教教派一样，归正教汇入了19世纪传教士伟大觉醒的潮流中，约二十年的期间，它在婆罗洲（1836年），中国（1842年），印度（1853年），和日本（1859年）正式成立了传教团，本书则是来华传教团的故事。

归正教会1842年2月24日在中国开始工作，当时大卫·雅裨里牧师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港，为在这里持续109年归正教的传道工作打下基础，这期间有超过150位归正教会传教士在厦门侍奉，雅裨里则是第一位。

Amoy这个词需要作一些解释，它既是一个城镇，Amoy市现在称为厦门市，同时它又是一个岛屿的名字。Amoy岛方圆约30哩，离岸仅几哩，位于香港以北约300哩、上海以南约550哩处。1900年Amoy市的人口估计为15万，聚集在靠近大陆这一侧。在Amoy岛西南方不到1哩处，还有一个小得多的岛屿，称为鼓浪屿，虽然雅裨里抵达那里时，只不过是一个渔村，但它最终注定成为传教团的总部。

厦门岛有优良的深水海港，是中国最好的港口之一。此外，这里有三条主要河流入海，与内地的交通方便，以至像同安、漳州和小溪等城镇，最终都成为下属的教区管理中心。由于和内地的交往方便，当时传教士的文献里把这一带也称作厦门，因此，从宣教的角度出发，这些地方都归入厦门，统称为厦门教区。

厦门地区属亚热带气候，主要的农作物有水稻、甘薯、甘蔗、花生、麻和烟草，通常为一年两熟或三熟，主要植物为竹、榕树和果树。地形为丘陵（甚至是山区），梯田沿坡而上直到山顶，山谷间散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的村庄。

从传道开始到1951年的宣教结束，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传福音——传播基督教的道理和为主赢得灵魂。然而，早期的传教士也投入教育和医疗工作，这两者都能合理地利用种种途径，实现圣经所强调的基督徒行善的责任。关注教育亦符合传道的实际需要，因为许多中国人是文盲，借此可以教他们阅读、鼓励他们使用圣经并看懂传教士分发的宗教小册子。

每隔十年的回顾，这些附属的任务——教育和医疗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他的事项也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今天看来，这些事可能都在“社会福音”的保护伞内。它们包括照顾孤儿、提高中国妇女地位、保护女婴和抵制包办婚姻、为鸦片成瘾者提供替代品、强调环境卫生设施的重要性。

本书计划从中国政治史的概述入手，对于那些很少或根本不了解该国过去的人们，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是必要的，这样才便于理解宣教团的工作是如何适应中国的

政治，而且还经常受到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影响。按当时的政治状况，在中国的传教历史从时间上分为四个阶段段：1842 年至 1863 年、1863 年至 1900 年、1900 年至 1937 年、1937 年至 1951 年。

第一阶段（1842 年至 1863 年）主要是注重宣教的基础工作。这一时期以 1863 年结束，是因为归正教会当年与英国长老会联合成立了闽南长老大会，它是第一个教会监督机构，并第一次按立了中国牧师。此时教育工作已经展开，并建立一座医疗诊所。在第二阶段（1863 至 1900 年）和第三阶段（1900 年至 1937 年），规范化是其中的主要工作之一，随着人员配备的齐全，福音传道、教育和医疗相得益彰。最后阶段（1937 年至 1951 年）包含三个章节，用一个更清楚的时间顺序来处理这段历史。那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按时间顺序来处理似乎是最好的做法，其中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建和内战、以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所有这些都对宣教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此项研究到 1951 年结束，那年最后一位归正教会传教士离开中国。

这里还要讨论本书中传教士用罗马字拼写中国字的方式。读者应该知道，有时罗马字在拼写这些中国名称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 Kulangsu（鼓浪屿），传教团总部最初往往把它拼成 Kolongsu。另一个例子，Iap Han-cheong（叶汉章），他是早期的中国牧师长，“I”有时被拼写成“Y”，偶尔还拼成“J”。为了统一起见，贯穿全书的这些罗马字拼写采用传教士最后几十年间在文献中最常用的拼写形式。

在此时出版厦门教区的历史，我还要再多写几句。本人作为一个始终对美国归正教会历史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不应忽视 1992 年是归正教厦门教区成立 150 周年的纪念。厦门教区似乎仅仅是早期一段短暂的历史，但我却越写越长，最后成为一本厚厚的书。这里有两重原因：（1）提供的研究材料相当丰富（2）书中大量引用迄今为止所能得到的，那些传教士自己讲述的冗长的厦门教区的传教故事。

致歉：

下面仅摘译本书正文的最后两章，也是试译者认为最有翻译价值的部分。为了弥补如此大的摘译空缺，前面先插入美国加州林振时医生对本书全文的简约参译本《筭路藍縷》共 12 页，林医生祖籍厦门，原加州《福音文宣社》社长。

对于一部按时间顺序编写的历史书，摘译是一种坏的做法，但限于能力和资源，只得行此下策，聊胜于无吧。为了衔接历史过程，从 1900 年开始的前六章，试译者均把每一章中与后面译文紧密相关的线索，简要地勾勒出来，姑且作为一种过渡。

译文中归正教会传教士的姓名，凡没把握的，均附在未页的“待定中英文译名对照”内。

目 录

致谢	VII
序言	IX
I 从远古到 1951 年中国的政治史概述	(1)
II 奠定基础	(13)
III 福音传道的做法	(31)
IV 1842—1863 的外国分会	(46)
V 建立布道的合作关系	(62)
VI 1863—1900 传教士和中国员工	(76)
VII 1863—1900 新教堂和宣教站	(91)
VIII 1863—1900 传教士的宣教旅行和探访事工	(104)
IX 1863—1900 初级教育和妇女教育	(118)
X 1863—1900 神学院与中学	(134)
XI 1863—1900 医疗的发展	(149)
筚路蓝缕	1
XII 1900—1937 人员配备、资金筹措和普世主义	13
XIII 1900—1937 福音传道	14
XIV 1900—1937 教育发展	15
XV 1900—1937 医疗发展	15
XVI 1937—1945 战争年代	15
XVII 1945—1949 战后	16
XVIII 1949—1951 传道结束	18
总结	31
引用书目	(344)
附录	(347)
尾注	(350)
索引	(381)
译附 待定中英文名字对照及说明	34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未翻译的原文页码

筭路藍縷

林振時

福音進入閩南史略

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起，美國歸正教會的宣教士對廈門地區的瞭解，發現當地缺乏合宜的教育制度，文盲甚多；又因重男輕女，婦女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百分九十多是文盲；社會上沒有近代的醫療設備，民眾缺乏衛生常識，疾病叢生，疫癘肆虐，有病無處醫，只靠迷信偶像，沒有神，沒有指望。

婦女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在家庭又受丈夫及家婆的虐待，只有早起晚睡，少吃多做，甚至有被毆打也不希奇。宣教士認為她們是世上最悲慘的，相信耶穌基督的救恩才能救她們脫離苦境，進入平安與喜樂。

初等教育與婦女教育

歸正教會一向重視教育，1850 年，就在廈門新街及竹樹腳禮拜堂各辦了一間小學。到 1900 年，共辦了十一間教會小學，共有 194 名學生，而以竹樹腳禮拜堂辦得最好，經常有四十多名學生。大部份是男童，因中國人不願女孩子單獨出門，也不喜歡男女孩太接近。

宣教士認為女孩子應該上學，可以改善婦女的地位，可以改變重男輕女的舊觀念，也可多領人信主。另一重要的好處是：讓神學院培養出來的傳道人能找到受過教育的配偶。

女子學校

1870 年，在廈門竹樹腳禮拜堂附近，開辦了女子日校及寄宿學校“毓德學校”，由 Helen Van Doren 宣教士負責。1870 年，學生 12 人，其中寄宿的 4 人，來自鄰近農村。1871 年劇增至 23 人，寄宿 8 人。1872 年 30 名女生，寄宿的佔一半。1876 年 Doren 宣教士因健康欠佳而回美。女校由打馬字師母負責，近四十年之久。

女校設在廈門市中心，靠近碼頭，地方嘈雜，宣教士住在鼓浪嶼，且健康也不太理想，故於 1879 年搬遷到鼓浪嶼，島上人口少，也較清靜，開辦學校比廈門優越得多。在這方面，美國歸正教會婦女部的支持甚大，她們關心廈門的教育事業與婦女事工。她們不但付出建設及經常費用，（住宿學生每年只付 15-20 元），在人力上也大大支持，女宣教士人數往往多於男宣教士，有時高達 2:1。

有了新的校舍，學生繼續增加，至 1899 年有學生 76 人，8-21 歲，平均 14 歲，宿舍不足應用。1900 年建新校舍，舊校舍給男生使用。鼓浪嶼成功的例子，令鄰近的地區，也相繼仿效，1888 年在小溪，1895 年在漳州，1896 年在同安，都先後成立女校。

學生讀羅馬字白話文，也學中國字，聖經是主要課本，要求學生背誦一些經文，如耶穌的比喻與神蹟，登山寶訓，詩篇等。高班的讀《天路歷程》、《海德堡教義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大部為中國老師用廈門話教導，女宣教士則較多管理女校事務。

女子學校的成績，給家長及社會人士看到受過教育的女孩子，同樣能充分發揮才能，也提高了社會地位。在教會事工上，日後可培養女宣教士，深入家庭宣教，好處更多。

毓德女校成績斐然，自 1870-1920，五十年內共收了一千五百名女生，畢業生分佈在國內國外各地，有讀大學，有做教師的，有做醫生的，宣教士的，都有非常好的聲譽。在以後的年月裏，成績更大，影響更廣，在此不多敘述。

廈語羅馬字

廈語羅馬字，或稱“白話字”，是打馬字牧師(John Van Nest Talmage, 1819-1892)創造的廈門音羅馬字拼音系統，用來準確記錄漢字的廈門字音，可作為認字的工具，也是宣教士學習廈門話的好工具。

文盲的婦女只要學習幾星期，就可以自己閱讀“白話字”寫的新舊約聖經，記事和寫信，比起學漢字快幾十倍。

1869 年，宣教士 Helen Kip，在竹樹腳禮拜堂，逢星期四下午禱告會後，教婦女半小時的白話字，效果好，這是“空前”的創造。於是在新街禮拜堂的打馬字師母(Mary Talmage)，在禮拜五下午禱告會後也教白話字，幾個月後，有四十人可自己讀白話字聖經及教理問答的書。

1871 年竹樹腳禮拜堂，又多開一白話字班，鼓浪嶼的福音堂也辦起同樣的班。都同樣有好的結果。

婦女聖經學校

另一方面，於 1884 年，美國歸正教會婦女部特別捐助 1300 元，在鼓浪嶼建一校舍，有一課室、宿舍及廚房的婦女聖經學校，作為教導婦女學習白話字及聖經之用，取名“Charlotte W. Duryee Bible School for Women”，以記念美國總會婦女部通訊秘書 Duryee。

該校由打馬字師母負責，除禮拜五到醫院探望病人外，每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00 上課，下午則由一位中國女舍監負責管理，另外還有兩位宣教士。

1884 年只收學生 5 人。

1889 年共收學生 24 人：歸正教會 10 人。

英國長老會 7 人。

倫敦傳道會 7 人。

該校的特點：

1. 校舍乾乾淨淨，尤以床架及廚房的乾淨，給人非常良好的印象。

2. 學生年齡在 15-70 歲之間，大多為 25-50 歲的婦女，可以共同學習和和睦相處數週至數月，也是中國社會比較少見的。

至 1909 年打馬字師母退休時，已有七百多人進過該聖經女校。這些學生可幫助牧師、傳道，對教會事工的開展甚有助益。

關懷嬰幼兒

宣教士看到中國的重男輕女，遺棄女嬰或虐待致死的惡習，以及孤兒院髒亂及無合理照顧，孤兒生不如死。1887 年得到美國歸正教會及英國長老會，以及本地人士的支持，在廈門租房辦起“憐兒堂”以收留棄嬰，不久後搬到鼓浪嶼一座二層的磚樓，二年內收留 15 個嬰孩，1900 年有 43 個嬰兒，孩子大了有的被領養，有的升學。後因人多，而分為二處，一由歸正教會辦理，一由英國長老會辦理。

培養傳道人

歸正教會為了讓中國人能獨立宣教，在早期就訓練傳道人，先在宣教士住處撥出地方訓練學生，直到 1869 年海外宣教部撥出 300 元，在鼓浪嶼一塊 30X40 呎的地上建一兩層樓的房子，一大廳作為課室與飯廳，十一間房間，一廚房。該樓稱為“Thomas De Witt Theological Hall”，以記念關心海外宣教的 De Witt 牧師。

神學課程為三年：包括舊約及新約解經，系統神學，聖經的真實性與正確性，講道學，教會史，中國語言與古文。另有數學，作為“訓練思考”的課程。（因傳教士認為當時的神學生缺乏這方面的訓練，當成立中學後，學生有數學訓練時，就取銷數學課）。

神學課程由新街禮拜堂的宣教士教導，中文由二位中國老師授課。

1892 年起有一講堂供學生練習講道之用，學生也有機會到廈門島內各聚會地點講道。

當時的學生未必都成為牧師傳道，如 1881 年時九名學生，只有三名是真的可稱為神學生，另有三名學生只適於當教師，二名日後做牧師助理，一名則勸其返回原來的職業，這些選擇都是根據學生各方面的表現而決定的。

當時在廈門的英國長老會與倫敦傳道會，也各有他們自己的神學院，三者卻能合作，互相聯絡，師生有一些共同的行動，建立共同的考試制度，在同一地區信仰相同，目標相同，能互相合作，減少重複的工作是難能可貴的。

尋源中學

歸正教會的宣教士在辦神學院過程中，發現如果在廈門能辦一間中學，讓小學成績優良的學生繼續造就，日後可當小學教師，更重要的，神學院才有合格的學生來源。英國長老會的同工也有同感，於是各自籌集資金共同為創辦聯合的中

學而努力。

該中學終於在 1881 年一月開學，設在鼓浪嶼英國長老會重修過的樓房裏開辦，學校的中文名是“尋源中學”（尋找真理之源），第一任校長為 Alexanden Van Dyck，限於設備，第一年(1881)只收 14 名學生，各公會按學生人數分擔教師的薪水及經營費用。但總的目標是：不久之後學生家長應負擔部分或全部費用。

學費：1889 年，每人每年 24 元，有的只交 8 元、3 元，大都分文未交。

後為了方便遠地農村的學生，就改為寄宿學校，要求所有學生都須寄宿，該校靠近英國長老會住處，故由長老會負責管理。

學制三年，課程包括地理，天文，生理學，數學，作文，古文，《海德堡教義問答》與聖經。用廈門話教，1889 年起，神學院的中國教師也參加中學教學。學生感到最難的是數學。

1890 年以後學制增加一年，就如美國的中學，課程：讀約伯記，箴言至瑪拉基書等，高級中文，高等代數，物理，歷史(美國，俄國，西班牙)廈語白話字的閱讀與寫作，圖畫與音樂(由女宣教士教)。

課程強調中國古文，因為考慮到要得中國人尊重就要懂得古文，尤以得知識分子的尊重。另一方面要求學生懂得西方的科學，這樣一流的訓練，才可能找到做傳道人以外，受尊敬而有用的工作，學生要懂得古文免得中國人認為“宣教士只要使中國人西化，而不是要基督化。”

時代不斷前進，學生要求學習“官話”(北京話，即國語或普通話)，因為中國十八個省份中有十一省用這種語言，又是官方用語，也是一種“客氣的”有禮貌的語言。所以 1897 年在中學三、四年級增加“官話”一科。這樣對學生日後的工作前途甚有助益。

英文課也是全中國基督教教育家劇烈爭論的問題，反對的人認為學生學了英文會“世俗化”，偏離原來辦學“佈道”的宗旨；有的認為教會的款項可以用來教“英文”嗎？另一方面，中國青年人卻要求學英文，有的就可能只是為了學英文而來讀書的；有的本來準備當教師或當傳道的，可能因學會英文，而轉念被吸引到高薪招聘英文人材的商行去工作，也是宣教士擔心的情況。

尋源的校長 Pitcher 也是贊成增設英文課程，他認為只要我們單純及堅持原則，是不用怕辦英文課的，有的認為還可以培養出有基督信仰的商人及政府公僕，倘若不開英語課，入學率也或許會受影響，經過考慮，英文課終於在 1904 年開辦。

中國人一向重視教育，但大都是舊式的，如私塾那樣的學校，不如外國較現代的校舍與設備，如地圖，掛圖，黑板，時鐘，科學儀器等，管理嚴格完善，整齊乾淨，所以到了 1900 年以後，中國人要求入學的也增多。

尋源中學辦學成績良好，1922 年已有學生 245 人。如 1921 年有兩位畢業生進入北京協和醫學院，其餘三分之一的畢業生列入候補名單，因北京協和醫學院每年只收 25 名學生。

以後各年均有良好的表現，如 1924 年 5 人進入廈門大學，2 人入福建協和大學，2 人進入廣州嶺南大學，6 人升入本地的神學院。

為了記念在廈門地區忠心服事四十年之久的打馬字牧師，於 1914 年將尋源中學的英文名定為 “Talmage College”。

為了進一步發展，尋源中學於 1925 年遷往漳州，佔地十八畝可以服事內地漳州的廣大教區。

在經營上，除了大的建設由母會婦女部大力支助外，希望能由中國人逐步走向自立的目標。

重視靈性

雖然增加許多課程，但學校一有機會就向學生傳福音，告訴年青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強調基督教的偉大真理，一個人如無專注事奉主，就不能算是成功生命。

學校每日早上九時及晚上七時半聚會一小時，有唱詩、讀經、短講及禱告，每名學生都必須參加週五晚上的聚會。禮拜天上下午都希望學生參加禮拜。

醫療工作

教育與醫療工作是宣教事工的助手。教育培養未來的人材，會有深遠的影響，但接觸的人較少；而醫療工作影響所有的人，不論那一階層，都有可能患病，接觸面廣，影響也深。

清朝末年，中國的醫療衛生仍甚落後，社會上沒有現代的醫療設備與人材，人民只有依靠古時的草藥或中藥。

在 1842 年至 1887 年間，曾有一些美國和英國的醫生出自愛神愛人的心，自費或由教會支助（如英長老會），不遠萬里前來廈門行醫施藥，但大都是小規模，或是幾年或幾個月的工作，缺乏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更缺乏後繼人力物力，故時斷時續。

這時美國歸正教會在廈門的宣教工作已有良好開端，仍沒有固定的醫療人員及設備，宣教士經過多次向總會反映，終於派出一位女醫生 Dr. Y. May King 到廈門，該醫生為華裔，二歲時為一美國醫療宣教士 Dr. MacCartee 所收養，並培養為醫生，但這位二十多歲的女醫生，健康欠佳，來了數月就返回日本橫濱其養父處。

鬱約翰醫生

等到 1888 年鬱約翰醫生 (Dr. John Abraham Otte, 1861-1910) 來廈門時，歸正教會才真正開始了醫療工作，鬱醫生六歲時 (1867 年) 隨父母從荷蘭移民美國，自幼受教會宣教熱忱薰陶，有心作傳道工作，後因患白喉，聲音受影響，以後升學，對科學知識有興趣，大學時學土木工程，畢業後升入密執安大學醫學課程，

準備日後作醫療宣教士，歸正教會外國宣教部答應畢業後派他去廈門，但當 1886 年畢業時，差會卻缺乏必需的款項，而未能立即成行。

鬱醫生於是決定到他的祖國荷蘭烏特勒支大學及阿姆斯特丹大學，繼續比較先進的醫學訓練一年；另一方面，相信荷蘭人民知道他將到中國宣教，也會提供一些款項幫他宣教。一年後回美國，差會已準備好款項，於是在 1887 年 11 月 5 日，自紐約坐帆船出發來華，同行的有他太太和華約翰牧師 (Rev. John Fagg) 也是剛被分派到中國。途中經過荷蘭鹿特丹，停留數日，也收到另外一些支持他的款項。

鬱醫生終於 1888 年 1 月 13 日來到廈門，差會分配他到廈門西南約 100 公里的平和縣小溪，當時小溪是一小鎮，人口雖然只有 8000 人，但鄰近有 350 個村，三十萬人口，有一條相當好的道路可通向鄰近富饒的河谷平原，有河道直達廈門或內地。當時當地的教會相當興旺，且設立一女子學校，又有一位原在廈門很受尊敬的葉漢章牧師，和一位年青能幹的宣教士 Alexandar Van Dyck。

小溪醫院

沒有分配在廈門服事，鬱醫生有點失望，不過他馬上想到是神的工作，也是合理的安排，沒多久就來到小溪鎮。

來到這裏，一切都要從零開始，雖然從美國與荷蘭帶來 1200 元，供他分配使用，但客觀困難甚多，首先是當地居民的反對，醫院就意味著將有病人來來往往，垃圾的問題，也會有死人的進出，對只看到自己利益的世人是常有的心態，但衡量利弊，為時不久，就沒有人再反對，地方上的官員及富人都伸出援手，醫院建設也就順利進行。

鬱醫生是先念土木工程，然後念醫的，就親自設計醫院，並監督工程的進行。建築材料要從別處逆水運來小溪鎮，本地泥水匠缺乏嚴謹誠實的工作態度，需要鬱醫生親自動手，並仔細監工，以免牆不垂直，或灰泥不按質量，馬虎了事，留下隱患。

當地找不到合格的木工，鬱醫生就親自動手製作，所有的傢俬，幾乎都是他親手造的。經過一年的辛勤努力，終於在 1889 年初，以 1800 元建成一座嶄新的兩層樓的醫院。有三十張病床的醫院。樓下有一藥房，診室，女病房，小禮拜堂，儲藏室與廚房，二樓為男病房，眼科病房，外科病房，兩間學生宿舍，還有寬廣的陽台。樓下男女病人各有一個露天的院子。

醫院落成使用

1889 年 3 月 5 日上午八時左右，在醫院內小禮拜堂舉行簡單奉獻禮，由小溪的中國牧師主持，參加的有鬱醫生及西教士 Van Dyck，鬱醫生的學生和一些病人。先唱一首聖詩，然後牧師祈禱、讀經、短講。

鬱醫生堅持將小溪醫院的英文名定為 “Neerbosh Hospital”，以記念他不久

前在荷蘭讀博士後課程時，在荷蘭尼布許(Neerbosh)市一大孤兒院醫治流行麻疹時，工作數週，照顧患病，後來孤兒們捐出一些錢支助他來華工作，也是他得到的第一筆讓他來華的款項。所以他特別感動，要記念拿出這一筆款項的尼布許孤兒院。

醫院開診當天就看了八十名病人，以後病人不斷增加，醫院就規定每天只看八十五人，免得連醫生都拖垮了，病人往往在半夜就來等候，以免向隅。

病人甚多，醫生後來得一中國牧師的兒子為助手，(曾在廈門英國長老會醫院學醫)，另一青年西教士則幫助配藥。夏天七、八月間農忙時大部關門，醫生也可以如其他西教士那樣得到休假。

病人有窮乞丐，也有富人，有平民，也有官員，開門三個月就看了 1500 病人，七千次治療。

因為有美好的聲譽，病人激增，醫院也不斷擴大，病床由 30 張，增至 45 張，面積增加一倍多。

其中有兩小房間，算是特別房，因為有的有錢人家不願住大房，寧願花多點錢，住小房間，其妻子也可來服事，所以醫院設法滿足其要求，也可多些收入，幫助其他付不出藥費的人，是個妥善的安排。

擴充醫院的經費主要來自中國人，包括基督徒及非基督徒。西教士也有獻金支助的，美國及荷蘭信徒也有獻金支持經常費的。中國人除了捐錢外，大都是出力，協助建築等等。

鑒於鴉片對中國人的毒害，鬱醫生於 1891 年特別蓋了一房間來治療鴉片煙癮者，看到他們戒煙時的痛苦，聯想到將來地獄的痛苦也是如此難忍。他想：“英國人將鴉片強迫輸入中國的罪，就算向各差會銀櫃投進多少千英鎊，也不得赦免其過。”

先聽道，後看病

除了看病外，醫院規定每天上午九時，在小禮拜堂裏有講道，來看病的都要進去聽道，然後開始看病發藥。住院的病人也有住院方面的靈性關懷，如教導讀經、唱詩、背聖詩等。出院後，也有人去關心跟進。

歸正教會甚重視靈性的長進，醫療只是宣教的助手，也不是為發展宗派，也不想建立起美國式或荷蘭式的教會，他們心中都有數，只想中國人能自立，自傳，自養；所以，他們及時培養中國人自己的學生、學者、醫生、傳道人。

鬱醫生也收醫學生，開始是四年制，後改為五年制，課程是全面而嚴格的。

自 1889 年 3 月醫院開門至 1895 年 1 月，這六年共診治了五萬門診病人，2400 住院病人，做了大小手術 1500 次。鬱醫生一家於 1895 年一月回美國休假，出門前將醫院交給另一位醫生 Dr. I. S. F. Dodd，只因他身體欠佳，只做了幾個月，小溪醫院只好關門。直到 1900 年另一位醫生，Dr. C. Otto Stempf 來接任才恢復。

鬱醫生於 1897 年回國述職完畢回廈門。在美國時，差會已通知他，計劃在廈門建一醫院。

因英國長老會設在廈門的醫院，沒有合適的醫生而於 1894 年關門，廈門極需一有規模的醫院。

鬱醫生是位神特別使用的僕人，不但有關心人靈性的心，又是建設，經營及白手起家的能手，原本英國長老會的醫院舊址擱置數年，損壞嚴重，修葺已不可能，重建地基花費更為可觀，而且最大的問題是該處雖鄰近禮拜堂，但居民密集，地區嘈雜，碼頭上魚鮮果菜進進出出，為全市一個頗為不潔之處，於是鬱醫生決心另選地址。在猶豫不決之時，廈門美國總領事建議在鼓浪嶼建醫院，該小島人口稀少清靜，環境乾淨，利於治療休養。鬱醫生也同意選在鼓浪嶼東北角海邊，面對廈門島市區，漲潮時三面有水，距離鼓島居民區僅一小段距離，真是不近也不遠，遠近適中。地點無問題，只是也有反對之聲，這次不是出自中國居民，而是在鼓浪嶼的外國商人及外國領事們，因當時鼓浪嶼實際上已成為“萬國租界”。他們來勢洶洶，告到北京，告到美京華盛頓：反對在鼓浪嶼建設醫院，以免把病人帶進鼓島。但毫無效果，兩邊政府都沒有出面干涉。

鬱醫生的折衷辦法：一些不需留在鼓浪嶼的男病人，安排住在廈門另設的病房。一些外國人或較富有的病人，可付較高款項，住較小的房間，這樣消弭反對之聲，也可幫助醫院的經費。

醫院不收藥費，治療費及住院費，但收相當於 2 分半美金的伙食費；醫院供給飯食，病人家屬不得在院內院外自行煮食，因為鬱醫生觀察到中國人對飲食衛生的重要性仍不明白，過去英國長老會的醫院任憑病人家屬煮食，病人可省些錢，但髒亂及不衛生的飲食，對病人是得不償失的事。

除去阻力，醫院順利建設，建醫院仍然是由鬱醫生自己設計，自己參加監督，不到一年(1898 年)就建成，稱為“救世醫院”(Hope Hospital)。

救世醫院是兩層樓房，有一小禮拜堂，飯廳，廚房，兩間工人房，辦公室，藥房，眼科暗室，學生房四間，病房七間，可容 45 張床。

這醫院於 1898 年 4 月正式開幕，立即宣佈並奠基在該醫院後面另建一供女病人用的醫院。

內部與建成的部分，基本相同，只是沒有禮拜堂及手術室，而與“男醫館”共用。該女醫館的英文名是“Wilhelmina Women Hospital”(威赫明娜女醫院)，或有時稱為荷蘭女醫院(Netherland Women's Hospital)以記念鬱醫生的祖國荷蘭團體及個人的贊助：因建築費用 2518 元，及另外 800 元經營費，均由歸正教會自由運用，在以後特殊需要時，也及時幫助。如荷蘭威赫明娜女王知道醫院急需護士時，派出二名荷蘭護士前來協助，為 1926 年正式成立護士學校打好基礎。

在建築過程中，鬱醫生也同樣發現當地非但缺乏設計人才，工人素養也是問題，往往陽奉陰違，或馬虎從事，所以他需要親歷其境，滿身灰泥或柏油。

後來兩間醫院合併管理，中文名稱仍為“救世醫院”，英文名稱為

“Hope-Wilhelmina Hospital”。

那時候，每日開診前都先有傳道的聚會，由傳道人或醫生短講，然後開始一天的工作。

鬱醫生也是位熱心的傳道人，因此於 1896 年回國述職時，總會讓他在密西根州大湍流域(Grand Rapids, Michigan)的第一歸正教會按立為牧師。

鬱醫生在鼓浪嶼仍然一邊行醫一邊教學，1898 年收九名男生，四名女生。他招生的原則是：要求學生獻身於基督教，受訓練時要熱心參加宣教事工，如教主日學，輪流在醫院小禮拜堂裡講道，到鄰近住宅區佈道，每晚參加二十分鐘醫學生禱告會。學生參加工作是義務的，醫院免費供給住宿及伙食。不願接受這種安排的人，他毫不猶豫地不加考慮。

鼓浪嶼救世醫院於 1900 年門診人數達 10200 人次，在鼓浪嶼本院及竹樹腳的小病房裏共收入 1206 名病人。進行外科手術 631 次，拔牙 155 次。病人來自鄰近各處，也有從一百英里外來的。救世醫院隨著就診人數增加不止，到 1916 年樓房也隨之加高一層，成為三層樓，又另蓋新的辦公大樓及其他設施，也有發電設備等等。

救世醫院的擴建費用，只有小數是來自差會，而主要來自中國朋友，美國的教會或團體，中國人的捐獻常常是巨額的，共捐了 5000 元修葺醫院及建結核病人休養所；另一筆近 3000 元購買 x 光機，另一筆捐助建新的發電廠。

有一中國人送一特別禮物給醫院，一匹馬，馬夫及飼料費用都不必醫院負責，供醫生出門探望病人及巡視三間教會學校之用，顯明當地居民對宣教工作的支持。

另一件頗為特殊的是，美國駐鼓浪嶼領事館送一艘汽艇給救世醫院，原來美國人辦的救世醫院，順理成章成為美國領事館的醫師，並協助美國公共衛生部在廈門辦理移民的健康檢查，檢查那些要去菲律賓(當時菲島為美國的殖民地)或美國的人，協助辦理健康檢查，讓菲律賓及南洋各地的華僑對救世醫院留下美好印象。

鬱醫生為主在此全人獻上

在這裡，應該提一提那位設計並建設小溪醫院，及鼓浪嶼救世醫院的鬱約翰醫生，他不但關心人的靈魂，也將西醫醫術帶給中國人。於 1910 年 4 月 6 日因診治一肺炎型鼠疫的青年病人後，染上鼠疫，在 4 月 14 日息勞返回天家，享年 49 歲。他是位神所喜悅的忠心工人，也是我們美好的榜樣。

除小溪及廈門的醫療工作外，在福建同安、漳州及龍岩都有相類似的醫院建設及服務，都得到大家的肯定與支持。

美國歸正教會在廈門的工作一直進行，甚至在抗日戰爭時期也與中國人共甘苦，雖然許多宣教士撤回美國，仍念念不忘他們的“第二故鄉”，設法多進修技術及北京話，等候機會再投入事奉的工場。

教會自立

自從鴉片戰爭後，列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及美國限制中國移民，更促使中國人產生排外情緒，因而差會更看到建立華人自立教會的重要性及迫切性。

1872 年打馬字牧師在年報上，主張應及時訓練教會獨立，不依靠外國教會而成為“慈善教會”，不單顧自己的教會，也要去幫助其他教會，學習贈予的樂趣，而非只懂接受人的好處。

宣教士鼓勵中國信徒應自立，能支付牧師傳道的薪金，故廈門新街及竹樹腳禮拜堂都能由會友負責牧師的全部薪酬，雖然採取低薪制。

1880 年代其他各教會牧師的薪水，最高為每月 12 元；起薪為每月 6 元左右，然後按能力及經驗逐步增加，但也少有人達到 12 元的最高標準。根據差會 1880 年的年報表明，為了避免有人以“不當的動機”而想在教會內工作，而特意採取低薪制度。

1888 年歸正教會的報告說明：“屬下八間教會，五間已可自立。”1898 年的報告：“鳳山(Hong-San)教會自己負責牧師的薪水及教會所有日常開支，學校教員的四分之一薪水，及奉獻 13 元供國內宣教之用。同安的教會循著自立的方向負責牧師的薪金，教會全部開支，教員薪水的一半，並奉獻 40 元作為國內宣教之用。差會則負責佈道所傳道的薪水，及學校教員薪水不足之數。”

在 1891 年的差會報告中指出：傳道人的薪水雖為數不多，但應考慮到一般中國人的收入，每月只 4 至 6 元，有的還低於此數。正如名牧打馬字牧師 1868 年所說的：中國信徒所付出的已與其收入頗為相稱。

年報指出：當時有的教會付出的比其他教會多，如 1901 年新街禮拜堂有會友 108 人，年均每人每年奉獻 8.88 元，至少相當於美國教會每人每年奉獻 44 元。竹樹腳禮拜堂會友 79 人，平均每人每年奉獻 13 元。各教會共有 1400 名會友，平均每人 5.85 元。

差會得自美國的支持，受美國經濟情況影響甚大，時多時少；但一些關心海外差傳的團體及個人常有一些特別的獻金，使一些特殊需要得到及時的幫助。

除了經濟獨立，在管理及人事方面，歸正教會亦及早訓練中國傳道人，並安排他們參加閩南分區會議及大會，共同討論教會各項事工。以便逐步退出，免得被認為是美國人或差會的教會。

隨著 1927 年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成立，閩南的大會改稱為“中華基督教閩南大會”。

戰後重建

1945 年 12 月(停戰後四個月)，就開始有宣教士回到廈門，福懿慕姑娘(Tena Holkeboer)用廈門話說，她有時是“飛”，有時是“爬”回來的(諧音)，表示當時中國大陸道路破壞，交通不便的情況。至 1946 年底，已有 36 位宣教士在廈門